

论欧阳修诗歌艺术的复合式结构 及其历史地位

王培友

提 要 欧阳修古诗长调中,存在着明显的结构主线和情感主线有机交织的“复合式结构”,按照欧诗中复合式结构之两条主线的结合方式,可以把欧诗中的复合式结构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以“岂(+)……(+)”或“(+)……岂(+)”句式和“……(+)而……”句式为基本构型的复合式结构形式,另外一种是以情感的发展来统摄事物景象的复合式结构形式。欧阳修形成复合式结构这种诗歌表现形式,经历了长时期的探索。欧诗的复合式结构表现形式,对宋诗发展过程中形成“破体”风尚具有重要意义,并对形成宋诗主体面貌有重要作用,也有助于开拓古代文学研究的新空间。

关键词 欧阳修 诗歌 结构 破体

自宋末开始,“宗唐派”与“宗宋派”就围绕诗歌取法范型问题展开了长达近九百年的争论,后世对宋诗的历史评价便深受其影响,并延续至今成为左右当今文学史写作的重要标准。但值得注意的是,“宗唐派”与“宗宋派”除了都承认欧阳修的历史地位以外,似乎对欧诗的评价均不甚高。如清人贺裳就认为:

欧公古诗苦无兴比,惟工赋体耳。至若叙事处,滔滔汨汨,累百千言,不衍不支,宛如面谈,亦其得也。所惜意随言尽,无复馀音绕梁之意。又篇中曲折变化处亦少。

公喜学韩,韩本诗之别派,其佳处又非学可到,故公诗常有浅直之恨。^①

这里,贺氏虽然注意到了欧诗善于铺陈摹写,使用散文手法来布局谋篇的特点,但同时又以为欧诗“无兴比”、“意随语尽”、“篇中曲折变化亦少”,故“欧诗有浅直之恨”。客观地说,“宗唐派”对欧诗的某些评价显失公允是可以理解的。但“宗宋派”诗人对欧诗的疏离,倒是值得玩味的。以“宗宋派”的清代诗人为例,从翁方纲、蒋士铨到以沈曾植、袁昶、陈三立等为代表的“同光体”诗人,似乎都是对苏、黄关注度很高,而极少提及欧阳修及欧诗。显然,连“宗宋派”都有意无意地对欧阳修及欧诗有所疏离,因此,历史上对欧诗的认识多取“宗唐派”的负面评价,亦在情理之中。

仔细想来,只是因为对欧诗极少展开研究,就有意无意地看低其历史价值,这对欧阳修及欧诗都是不公正的。事实上,欧阳修逆唐风而辟蹊径,舍兴比而接承韩诗并独创风貌,引领后来者如苏、黄等开出宋诗的崭新气象,这种贡献无论如何是不能被忽略的。由此,回过头来看贺裳的评价,就会发现其中存在一些错误的判断。贺裳遗憾于欧诗“无兴

^① 贺裳《载酒园诗话》,见郭绍虞编选,富寿荪校点《清诗话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411页。

比”、意随语尽”、“篇中曲折变化亦少”,前两者正说明了贺裳保守的诗学观,后一条则属贺裳判断有误。从文学性而言,“比兴”可作诗歌之美,叙事铺陈何尝不是诗歌之美?含蓄蕴藉或者意随言尽,在艺术的花园里,都是绽放的奇葩。可以说,只有从具体的历史语境中来认识欧诗,才会对欧阳修及其杰出的诗歌创作有公允的评价。本文打算从欧诗文本出发,对欧阳修诗歌艺术的复合式结构表现形式及其形成过程进行探讨,进而论及欧诗的历史地位问题。

一 欧阳修长调诗歌中的复合式结构形式及其功能

欧阳修自觉地以韩诗为学习的范型,特别是学习韩诗以散文写作的方法来入诗,从而使其诗歌创作展现出独有的风韵面貌,此属学界共识问题。但是,欧阳修诗篇中多用感叹词、转折词和递进词的表现技巧,却是韩诗很少有的。仔细考察可见,欧阳修古诗长调中,存在着明显的结构主线和情感主线有机交织的现象,我们称之为欧诗诗歌的“复合式结构”。按照欧诗中复合式结构之两条主线的结合方式,可以把欧诗中的复合式结构分为两种情况分析。

(一) 欧诗中以“岂(+)……(+)”或“(+)……岂(+)”句式和“……(+)而……”句式为基本构型的复合式结构。

欧阳修发展了韩愈的诗歌创作方法,代之以全方位地以写作散文的方式入诗,韩诗散文的结构布局、遣词造句、表达方式等,都成为欧诗借鉴的对象。从句式构成方面来看,欧诗常把感叹词同转折词、递进词和并列词连用,以求取得某种表现效果:

1. “岂(+)……(+)”或“(+)……岂(+)”式。包括:岂不……亦、岂知……、岂比……、岂惟、岂敢……、岂无……所得、岂不……而、岂不……亦、虽……岂、岂……犹、方……岂等。这种句式,往往是把感叹与反问、递进、转折等结合在一起。从句式上看,使用这种构型方式,往往在诗歌逻辑关系的多种展开过程中寓含着作者多重的情感。就是在诗篇结构的总束、分说、递进、转折等多种关系中,寓含着作者或深沉,或感慨,或意气飞扬,或思致萧索,或意志消沉的情绪。

感叹与反问的结合,常用的连接方式有“岂不……亦”、“岂不……何”等。例如《秋怀》(治平二年):“节物岂不好,秋怀何黯然。西风酒旗市,细雨菊花天。感事悲双鬓,包羞食万钱。鹿车终自驾,归去颍东田。”诗中,感叹词“何”与反问词语“岂不”表达出强烈的感情,使作者的悲秋情怀得到凸显。类似的句式有:岂知……,岂比……,岂惟、岂敢……等。

感叹与递进结合,常用的连接方式有“虽……岂”、“岂……犹”等。例如《送任处士归太原》(时天兵方讨赵元昊。康定元年):

一虏动边陲,用兵三十万。天威岂不严,贼首犹未献。自古王者师,有征而不战。胜败系人谋,得失由庙算。是以天子明,咨询务周遍。直欲采奇谋,不为人品限。公车百千辈,下不遗仆贱。况于儒学者,延纳宜无间。如何任生来,三月不得见?方兹急士时,论策岂宜慢!任生居太原,白首勤著撰。闭户不求闻,忽来谁所荐。人贤固当用,举缪不加谴。赏罚两无文,是非奚以辨?遂令拂衣归,安使来者劝?嗟吾笔与

舌,非职不敢谏。^①

诗中,“天威岂不严,贼首犹未献”,上句以“岂”为反问语气,目的是引出“贼首”还没有被打败俘获的战争现实,这就为下文展开对“贼首犹未献”的原因分析预留了伏笔,最终过渡到诗篇主题:为任生的不遇遭遇鸣冤,同时也表达出作者对庙堂大臣压抑人才的愤怒之情。

感叹与转折结合,常用的句式有“岂不……而”等。例如《飞盖桥玩月》(《欧阳修全集》,第28页):

天形积轻清,水德本虚静。云收风波止,始见天水性。澄光与粹容,上下相涵映。乃于其两间,皎皎挂寒镜。余晖所照耀,万物皆鲜莹。矧夫人之灵,岂不醒视听。而我于此时,翛然发孤咏。纷昏欣洗涤,俯仰恣涵泳。人心旷而闲,月色高愈迥。惟恐清夜阑,时时瞻斗柄。

诗中,“岂不醒视听”,是由观月而引发出这一月景对于万物之灵的人类而言,都会具有“醒视听”的作用。然后,诗句中用一转折词“而”,使诗意发生了转折,至此诗意才开始表达作为创作主体的诗人的月下意趣情态。可以说,感叹词与转折词的使用,在诗篇中有机地把结构线索与情感线索结合在一起。

上述分析可见,欧诗中,一些诗句中的语气词的使用与句式的变化密切相关,诗意或加强了语气,或使诗意出现转折变化,或使诗意变得感慨遥深,感情的发展变化往往与结构的变化有机统一在一起,诗篇中具有了多重的意味。

这种写作方式,标志着诗篇中出现了两种线索:结构线索和情感线索。这两种线索,又以“岂(+)……(+)”或“(+)……岂(+)”式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而使诗篇具有了复合之美。这里,语气词与其它词的搭配,是欧阳修的重要发明。

这种诗篇结构方式,虽然在唐代韩愈诗歌中有所使用,但韩愈只是偶尔使用这一表达手法。对比来看,欧阳修庆历年间的诗歌,多用这种方式。而据本文稍后的分析可见,庆历年间,欧诗的风貌才真正成熟。这说明,欧阳修使用这种复合式结构方法安排诗篇,应该有比较明确的意图。作于这一时期的诗篇,使用的感叹词与关系词结合的情形,是比较多的。如:

《读书》:岂敢取声名,惟期脱贫贱。(《欧阳修全集》,第61页)

《留题齐州舜泉》:岂徒邦人知乐此,行客亦为留征轩。(《欧阳修全集》,第64页)

《又和》:与世渐疏嗟老矣,佳辰乐事岂相关。(《欧阳修全集》,第88页)

《再和》:佳玩能令百事忘,岂惟闲伴倒余缸。(《欧阳修全集》,第90页)

《哭曼卿》:但惊何其衰,岂意今也无。(《欧阳修全集》,第7页)

欧诗这种句式的使用,在感慨之际往往能够同时起到诗意的递进、转换、总结等多种作用,大大丰富了诗歌的表现方式。

2. “……(+)而……”式。包括:岂不……而、俄而……、既而……等。这种句式,在欧诗中使用次数较之“岂……但”句式较少,如其诗句中表示转折关系的:

《怀嵩楼晚饮示徐无党无逸》:一来勤已多,而况欲久留。(《欧阳修全集》,第24

① 欧阳修《欧阳修全集》,北京:中国书店据世界书局1936年版影印本,第6页。

页)

表示递进关系的:

《寄内·班班林间鸠》:又闻说朋党,次第推甲乙。而我岂敢逃,不若先自劾。
(《欧阳修全集》,第13页)

表示并列关系的:

《聚星堂前紫薇花》:而我不强饮,繁英行亦坠。(《欧阳修全集》,第27页)

欧诗中,使用“……(+)而……”句式来在诗篇结构的布局中,把句意作或递进或转折或并提等各种逻辑关系的展开,往往使前后诗句构成转折、递进和对比关系。这种展开,同时也使诗中的主体情感随之发生了变化。这种句式的使用,与前述“岂(+)……(+)”或“(+)……岂(+)”句式有机统摄情感结构主线与诗篇结构主线是相似的,此不赘述。

上面,简要分析了欧诗中复合式结构的二种句式。这两种句式,是显性的。除此之外,欧诗常用的感叹词、转折词和递进词,还有“已……而”、“初谓……既又”、“乃知”、“又”、“奈何”、“嗟”、“岂顾”等。这些词,与上面所举的两种句式一起,往往在具体的诗句语境中,起到递进诗意、强调诗旨、吐露感情、点明写作线索等作用。

(二)以情感的发展来统摄事物景象的复合式结构形式。

除了以上述二种以显性的方式有机地融合情感线索和结构线索,以形成复合式的诗歌主线外,欧诗中还有另外一种重要的安排诗歌结构的方式,即以情感的发展过程来统摄事物景象,以达到表达诗旨的目的。以这种方式写作的诗篇,虽然没有一些明显的转折词、感叹词来糅合情感结构与诗歌结构,如在诗歌中看不到关联句式,如“岂(+)……(+)”或“(+)……岂(+)”句式,以及“……(+)而……”等,但仔细考察诗篇的文脉意路,仍然内含有情感线索和结构的线索。只不过以这种复合式结构的安排方式写作的诗歌,在形式上看不到痕迹而已。如欧诗《晋祠》:

古城南出十里间,鸣渠夹路何潺潺。行人望祠下马谒,退即祠下窥水源。地灵草木得余润,郁郁古柏含苍烟。并儿自古事豪侠,战争五代几百年。天开地辟真主出,犹须再驾方凯旋。顽民尽迁高垒削,秋草自绿埋空垣。并人昔游晋水上,清镜照耀涵朱颜。晋水今入并州里,稻花漠漠浇平田。废兴仿佛无旧老,气象寂寞余山川。惟存祖宗圣功业,干戈象舞被管弦。我来览登为叹息,暂照白发临清泉。鸟啼人去庙门阖,还有山月来娟娟。(《欧阳修全集》,第11页)

诗篇有叙事,有议论,现实之景与历史时空得到有机结合,将晋地多战争、并儿多豪侠与当今并人多游乐、并地尽享太平相对比,与历史空间的转换中,感慨遥深,诗篇最后以鸟啼、山月作结,更增添了余音袅袅的滋味。显然,诗篇时空跨度很大,情感跌宕起伏与景物密切结合,文气自由流转等特征,这种以情感的发展线索来统摄景物、事项的写作技巧,正是形成欧诗“感慨遥深”风格的重要原因之一。这样的诗篇,在欧诗中还有《春日西湖寄谢法曹歌》、《送胡学士知湖州》等。

较之第一种复合式结构形式,欧诗的这种复合式结构,极少在唐诗中出现。就拿韩诗来讲,虽然其中也有一些融作者情感变化于诗篇结构中的诗篇,但在其全部作品中所占比重极小。欧诗的复合式结构,与欧阳修之前的宋代诗篇以及与欧阳修同时代的诗篇相比,也具有独特性。宋初,白体和晚唐体在“诗格之格”方面,呈现出继续晚唐五代诗歌体式的历史沿革性。白体多用五七言律绝,晚唐体多用五言体,西昆体则多用七言律诗的形

式。比较而言,宋初三体中要数西昆体更加强调诗歌的体式要求,形成了后世所谓的“昆体工夫”。主要表现为西昆体诗人注重对诗句进行雕琢,诗句里往往含有多个历史典故,强调诗句的对偶、押韵以及诗句语言的色彩等写作方法的运用,追求诗歌雍容典赡、练词工整的诗歌风格。^①这显然顺承了晚唐五代的诗歌体式传统。宋初三体多用五七言律绝来写诗,古体、长篇律诗不多见。但是,到了梅尧臣、欧阳修、苏舜钦等人,诗人在诗歌中使用长篇来说理,成为一种趋势和流行的风尚。不过,梅尧臣、苏舜钦等人的诗篇,却与欧诗这种复合式结构安排方式不同。如苏舜钦的长调诗歌《吴越大旱》诗,诗篇首先对吴越大旱之景进行了细致的铺陈叙述,然后指出,朝廷为了西羌用兵而虐使吴越人民,致使死亡相继,怨气上冲九天,才是导致天气大旱无雨的原因。诗末作者没有对朝廷应该采取的不久措施提出建议,但却表达出对能够解除旱情气候的渴望,实际上也就是间接含蓄地表达出只有朝廷改变政治措施,才能解救难民的政治主张。诗篇多用赋体的铺陈渲染手法,刻画景象事物深切逼真,气势豪迈而且文笔冷峻,于含蓄中渗透着作者强烈的忧国忧民情感。又如梅尧臣的长调诗歌《范饶州坐中客语食河豚鱼》,诗篇描绘了河豚的腹、目等怪异形状,对其毒性与味美作出了一番拷问,最后,以“甚美恶亦称”这一哲理体验为结尾,使诗篇无论是在题材上还是审美情趣上,乃至以夹叙夹议为主要写作方法的选择上,都是新奇的。可见,梅尧臣、苏舜钦的长调诗歌,主要是采用议论方式来表达感情,这在表现方法上是与欧诗的复合式结构不同的。

不仅如此,欧诗复合式的结构形式,与稍后王安石诗歌也不同。虽然安石某些长篇古诗,也多向韩愈学习,使用散文的布局手法来安排诗篇结构,但安石诗篇,或寓冷峻的静观态度与精细的刻画之中,靠诗篇的曲折变换来展示诗旨;或直接进场对事件作评价。这种写作方法,显然是与欧诗有距离的。如其诗《酬王詹叔奉使江南访茶利害》,王安石以散文的写作手法,对榷茶之法进行评论,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对官营茶叶交易的危害性作出了批评,诗风思致深刻而见解独到,特别是对榷茶而致的危害,刻画细致,表现出安石凡是涉及政治议论便峭刻风生的风格。

上述可见,欧诗的第二种复合式诗歌结构表达方式,虽然其中没有标志物如感叹词与关联词的结合,但其诗中寓感叹于诗篇建构过程中的表现方法,仍然具有统摄情感与诗篇结构的意义,这种建构诗歌文本的方式,与北宋欧阳修之前和欧阳修同时代的人相比,具有其独特性。正因为此,欧阳修诗歌艺术的复合式结构,对欧诗的风格形成,就具有了重要的意义。方东树讲“欧公之妙,全在逆转顺布。惯用此法,故下笔不犹人,读者往往迷惑。又每加以事外远致,益令人迷。”^②正是看到了欧诗中借用“……(+)而……”等句式,以及内蕴有以情感的发展来统摄事物景象等两种表达方式所造成的艺术表达效果。这里,所谓“逆转顺布”,指的是欧诗中常见的转折、铺叙等表现手法;所谓“事外远致”,则大概指的是欧诗中常见的即景抒情或者抒发感慨的抒情方式。可以说,复合式结构的使用,是形成欧诗风格的重要原因之一。

① 《瀛奎律髓》卷18、《四库全书总目》等都提及了“昆体工夫”。

② 方东树《昭昧詹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276页。

二 欧阳修复合式结构形式的形成过程及其诗歌取法范式

在欧阳修生前,就有人对欧诗取法的诗歌范型问题做过探讨,如苏轼、王安石等人都有评论,但失之于简单,到了宋末元初的方回,方才对欧诗发展变化的历程及其特征进行了总结,他的观点值得重视。“读欧公诗,当以三法观。五言律初学晚唐,与梅圣俞相出入,其后乃自为散诞。七言律力变‘昆体’,不肯一毫涉组织,自成一家,高於刘、白多矣。如五、七言古体则多近昌黎、太白,或有全类昌黎者,其人亦宋之昌黎也。”^①客观地讲,方回对欧阳修诗风特征、变化轨迹及其形成原因等方面的分析还是比较粗略的,但总体来看,这个评论是合乎事实的。不过,欧阳修诗歌在取法过程中,历经了对前代及当代众多诗人诗歌的研究。按其取法前后时间顺序来看,主要是向晚唐诗体、韩愈与李白诗体学习。因此,欧诗在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风格取向。宋末元初方回对欧阳修诗法诗风演变过程的总结,大致是符合事实的。不过,欧阳修诗歌虽然主要向李白、韩愈和晚唐体学习,但是,在学习的过程中对其诗歌取法对象有所取舍,方回对此没有能够明确说明。因此,有必要对方回的判断进行补充。

欧阳修在嘉祐元年(1034年)返回汴京之前的作品,多是模仿晚唐体诸人而作。这一段时间,他多方探索学习诗歌的途径,与梅尧臣等人交流诗艺,并写有《拟玉台体七首》,诗歌创作上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就此期欧诗题材来看,他的诗歌大多是写景之作,虽然诗篇非常讲究对偶、用字,风格精巧,但格调不高,诗中的景与情往往结合不够紧密,整体上与晚唐贾岛、姚合等人的诗风比较相近。如作于明道二年的《早春南征寄洛中诸友》中,诗歌第二联对偶精切,全诗没有豪迈的气概和新奇的物象,所表露出的情感也很琐屑普通,这正是晚唐诗歌的特征。值得注意的是,欧阳修向晚唐诗风学习,并贯穿在其创作的整个过程中,如在嘉祐二年(1057年)欧阳修已经51岁,写有《刑部看竹效孟郊体》,标志着欧阳修即使在其诗名满天下之时,仍然推崇孟郊诗歌。

欧阳修洛阳任职完成后,于景祐元年(1034年)五月回京,其诗风开始出现明显变化,表现出向韩愈靠拢的倾向。本年写有《书怀感事寄梅圣俞》。诗中追述了在洛阳任职期间与钱惟演、梅尧臣、谢希深等人优游洛阳周围风景、耽于乐饮的“乐事”经历,表达出对分离故友的思念之情。诗中按照时间递进发展的线索,特别是对友人相聚以优游的“乐事”追述,使用了散体文写作中常用的铺陈以增华的写作手法。显然,这首诗已经透露出欧诗向韩愈学习,尝试着把散体文写作方法融入诗歌创作中的动向。如果说,这首诗学习韩愈以散体文来写诗的特征尚不很成熟的话,那么,作于景祐三年的《猛虎》,则标志着欧阳修终于把以散体文写作方法运用到写作诗歌中的尝试,达到了娴熟的境地:

猛虎白日行,心闲貌扬扬。当路择人肉,黑猪不形相。头垂尾不掉,百兽自然降。暗祸发所忽,有机埋路傍。徐行自踏之,机翻矢穿肠。怒吼震林丘,瓦落儿坠床。已死不敢近,目睛射余光。虎勇恃其外,爪牙利钩铎。人形虽羸弱,智巧乃中藏。恃外可摧折,藏中难测量。英心多决烈,自信不猜防。老狐足奸计,安居穴垣墙。穷冬听冰渡,思虑岂不长。引身入鞞中,将死犹跳踉。狐奸固堪笑,虎猛诚可伤。(《欧阳修全集》,第1页)

^① 方回《瀛奎律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98页。

诗篇首先渲染了猛虎的凶猛威武,继写猛虎丧生机矢之下,接着作者对此发出了议论,感慨奸狐、猛虎均不及人的智巧,最终葬送了性命。显然,诗篇有对猛虎凶猛特性和狐狸奸诈多疑性情的描述和刻画,也有按照因果顺序的原因叙述,最终以深沉的议论作结,诗篇熟练地使用了叙述、铺陈、议论等散文文的表现手法来表达主旨,反映出作者以文为诗创作风格的成熟,特别是最后两句以议论作结,诗意无复余韵,表现出欧诗基本风貌得以形成。

从景祐年间以后,学习韩愈把散文文的创作方法纳入诗歌中,成为欧阳修诗歌最为显著的特征。这种诗歌创作方式,在庆历年间欧阳修的诗歌创作中到达了高度成熟的境地,如其庆历元年(1041年)所作《忆山示圣俞》、《送胡学士知湖州》、《哭曼卿》、《送晁颖归庐山》;庆历二年的《送孔生再游河北》;庆历三年的《送扬辟秀才》、《送慧勤归余杭》、《读张李二生文赠石先生》;庆历四年的《晋祠》、《登絳州富公嵩巫亭示同行者》;嘉祐元年(1056年)的《赠沈遵》等,都是其学习韩愈以散文文写作方法而创作诗歌的代表作。如《赠沈遵》:

群动夜息浮云阴,沈夫子弹《醉翁吟》。《醉翁吟》,以我名,我初闻之喜且惊。宫声三叠何泠泠,酒行暂止四坐倾。有如风轻日暖好鸟语,夜静山响春泉鸣。坐思千岩万壑醉眠处,写君三尺膝上横。沈夫子,恨君不为醉翁客,不见翁醉山间亭。翁欢不待丝与竹,把酒终日听泉声。有时醉倒枕溪石,青山白云为枕屏。花间百鸟唤不觉,日落山风吹自醒。我时四十犹强力,自号醉翁聊戏客。尔来忧患十年间,鬓发未老嗟先白。滁人思我虽未忘,见我今应不能识。沈夫子,爱君一尊复一琴,万事不可干其心。自非曾是醉翁客,莫向俗耳求知音。(《欧阳修全集》,第40页)

清代方东树评论说(《赠沈遵》)此触顺题布放,而奇恣转胜用章法,乃知诗贵精神旺为妙也。起点叙,次写,次追叙,后以议收。‘我初’三句,低徊欲绝。”^①诗篇中,以“初”、“暂止”、等抒写沈遵的演奏过程,继之引发出自己因听琴而得的感受,因听琴而忆及做官滁州自称“醉翁”之时优游山水的乐趣,最后以对人生易老的慨叹和对沈遵的善意叮嘱作结,可见,正是因为以文章的布局安排为诗歌写作的基本方法,把叙事、议论结合在一起,眼前景与忆中事两种感受或实或虚,相互生发,而这两者都统一到感慨遥深的人生体验上来,从而使诗作呈现出起承转合浑然一体、虚实结合兴寄遥深的独特艺术效果。

欧阳修的诗歌取法范式是多元的。他对李白诗歌进行过深入研究,其诗风也有向李白学习的痕迹。苏轼论欧阳修,谓“论大道似韩愈,诗赋似李白”,说明欧阳修对李白诗歌的研究是很深入的。又如欧阳修推崇李白诗“清风明月不用一钱买,玉山自倒非人推”,宋人认为,欧阳修因此悟到了李白的飘逸之风,这就是欧阳修向李白诗歌学习的原因。^②这个认识是正确的。

欧阳修在长期的诗歌实践中,也向前代很多诗人进行了学习,这些诗人的创作经验都对他起到了正反两方面的作用。如在其诗集中,有《将至淮安马上早行学谢灵运体六韵》、《和谢学士泛伊川浩然无归意因咏刘长卿佳句作欲留篇之什》、《春寒效李长吉体》、《弹琴效贾岛体》、《刑部看竹效贾岛体》、《栾城遇风效韩孟联句体》、《寄题刘著作羲叟家

① 方东树《昭昧詹言》,第279页。

② 郭绍虞《诗话总龟前集》卷8,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90页。

园效圣俞体》等,这说明,欧阳修对其前代诗人乃至同时期诗人诗作的研究和摹写,是抱有严肃认真的态度的。除此之外,在其《文集》和《六一诗话》中,欧阳修还论及了屈原、宋玉;汉代的苏武、李陵;魏的曹操、刘桢;唐代王维、宋之问、沈佺期、陈子昂、杜甫、李白、白居易、李商隐、韦应物、孟郊、贾岛、周朴;五代的郑谷、王建、郑文宝;宋初的陶谷、九僧、杨亿、刘筠、钱惟演;同时期的晏殊、谢伯初、石曼卿、赵师民、梅尧臣、宋祁等人的诗歌。从时代诗风来看,也涉及到了《诗经》、《楚辞》为代表的春秋战国时代、汉、魏、齐、梁、唐、五代、宋初诗风。他对西昆体也进行过详细研究。^① 欧阳修对西昆体讲求用典的做法相当推崇,特别是对西昆诸人“雄文博学,笔力有余,故无施不可”的才学卓识,欧阳修表达了由衷的敬佩。显然,欧阳修是在认真研究了很多人作品后,才把韩愈、李白诗歌作为其主要的取法范型的。而对韩愈诗歌的学习,在归纳并形成了复合式结构的表现手法后,欧诗到达了一个新的高度。

三 欧诗复合式结构表现形式的历史地位

欧阳修自觉地以散文的方式来写诗,特别是他在庆历以后注重使用复合式结构表现形式,来进行诗歌创作,其中蕴含着重要的文化讯息。

(一) 欧阳修自觉地突破文体界限,以散文的笔法写诗,对北宋的文体“尊体”与“破体”风尚产生了重要影响。欧阳修“以文为诗”,早在景祐元年(1034年)即开始,而至迟在景祐三年已经成熟。因此发生于嘉祐二年(1057)“嘉祐文风变革”事件,绝不是偶然的。此时,距离范仲淹等人提出的诗文革新主张已有三十二年,距离仁宗天圣七年、明道二年两次下诏申诫文风已有二十多年,但时文仍旧延续破碎支离、注重形式之美的特点,而对裨于世用的政治功能有所疏离。这种情况一方面说明,一代文学风气一旦产生也同时即具有了独立的运行与发展规律,外在的政治主张如果没有相应的措施制约,并不能立即产生预期的效果;另一方面,欧阳修之前包括范仲淹等人在内的诗文创作者的文学成就,也不足以动摇延续日久的文学风尚。这种情况,直到欧阳修才发生改变。一则欧阳修本人的文学创作成就具有重大社会影响,二则欧阳修所团结和影响的人文,如梅尧臣、苏舜钦、石延年、宋祁等人也与之呼应,在文坛上具有极强的凝聚力。因此,欧阳修才能够在知贡举时,痛抑时文之弊。

过去的文学史家多注意在两个方面对此展开研究,即欧阳修依靠政治力量改变文风与欧阳修诗文创作的贡献,而对欧诗自觉地打破诗、文界限对于文体发展的重要意义,似乎认识不足。欧阳修“以文为诗”,与他在诗词创作中的诗与词的互渗,赋与文的互渗等,在总的方向上是一致的。欧阳修的这一努力,开启和推动了宋代诗、词、文、赋等文体的“尊体”与“破体”风气,他以复合式结构表现方式而开诗文互渗之路,实是开宋代文学风貌的重要尝试,对后来北宋诸文体的互动与发展起到了导夫先路的作用。

(二) 欧诗中采取复合式结构形式来展开长调诗歌,结构的起承转合往往与情感的起承转合相一致,这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中的长调诗歌写作中,具有独特的价值和广泛的影响。这种情况说明,静态的文本之下,还有更多的信息存在,进而言之,对文学的研究,除了立足文学本位的内容、形式、审美等方面的研究,和立足文化本位的政治制度、精神世

^① 欧阳修《六一诗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13页。

界、哲学根源等方面的研究之外,沉潜在文字之下的作者情感线索的结构方式、作品情感的建构方法,以及作者情感与作品情感的异同性等,也应该给予必要关注。特别是,文本之中的结构方式一旦与情感建构与流变方式有机结合,诗文就会呈现出非常复杂的内在结构形式。这恰恰是文学理论和文学研究应该加以注意的问题。进一步言之,文学话语的文本建构之中,有多层次的结构问题存在。以话语结构的研究为中心,可以实现语言学与文学研究的会通,以此为路径,可以开拓出文学研究与结构语言学研究的丰富学术研究空间。

三、欧阳修诗歌中的复合式结构表现方式,可能对苏轼产生了重要影响。并通过苏轼传递到之后的宋代作家身上,深刻地影响到宋代诗歌的风貌。如苏轼的诗《送程德林赴真州》:

君为县令元丰中,吏贪功利以病农。君欲言之路无从,移书谏臣以自通,元丰天子为改容。我时匹马江西东,问之逆旅言颇同。老人爱君如刘宠,小儿敬君如鲁恭。尔来明目达四聪,收拾驂骏冀北空。君为赤令有古风,政声直入明光宫。天厰如海养群龙,并收其子岂不公,白沙何必烦此翁。^①

诗篇的主旨明明是赞颂程氏,但却时时见出作者个人的爱憎情感。诗篇于叙述事件并加以议论的结构展开中,杂有作者苏轼的个人感情展开过程,这样,诗篇中的结构展开与作者的情感展开,以明线和暗线的形式获得了有机的统一。显而易见,这种写作方式,极有可能是苏轼向欧诗学习的结果。而由于苏轼对南宋诗歌产生了极大影响,因此,欧诗的这种复合式结构诗篇的方式,对宋诗的主体面貌,可能会产生重要影响。

作为转变宋代文风的重要人物,欧阳修在宋代文学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由于宋人之后有绵延八百多年的唐宋诗之争的文学之争,因此对欧阳修及欧诗的判断与评价,往往呈现出极为复杂的情况。近百年来的文学研究,虽然在很多方面具有超越前人的成就,但同时也要看到,唐宋诗之争的余波仍然没有消失,“宗唐”还是“宗宋”的历史争论,还会时时影响到研究者的判断标准与研究倾向。在这种情况下,立足诗文的文学本位来展开相关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惟其如此,对欧诗中的复合式结构表现方式展开研究,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作者通讯地址:王培友 北京 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 100083)

(责任编辑 晓 思)

^① 苏轼《苏轼全集》诗集卷3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436页。